

《迈向第二代本土研究》导读

肖小穗

香港浸会大学

摘要：过去三十年间，港台和大陆有关「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此起彼伏，文章写了很多，研讨会、对话会和座谈会开了不少，会议后的论文汇编也出过若干本。在传播研究方面，最近的有汪琪编著的英文专集《传播研究去西方化》（2011）、冯应谦、黄懿慧合编的《华人传播想象》（2012），以及黄旦、沈国麟合编的《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2013）。但独家发表的专著，目前还只有汪琪这部《迈向第二代本土研究》。行内早在打听这本书的「产期」，不久前《传播与社会学刊》邀请汪琪参加了一场「学术对谈」，谈的就是她对目前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看法（2014）。作为学刊一方的对谈人，我捷足先读了这部书稿，对谈时更是近水楼台，提出了一些问题，得到汪琪的解答，受益菲浅。所以我很愿意为这部新作写些什么，虽然自忖没有评价它的资格，但还是愿意分享我的点滴心得，希望能起点「导读」的作用。

[Xiaosui Xiao. Introduction to “Toward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indigenous research”. *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5;11(3): 90–93].

关键词：港台；大陆；社会科学本土化；传播

过去三十年间，港台和大陆有关「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此起彼伏，文章写了很多，研讨会、对话会和座谈会开了不少，会议后的论文汇编也出过若干本。在传播研究方面，最近的有汪琪编著的英文专集《传播研究去西方化》（Wang, *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ltering questions and changing frameworks*, 2011）、冯应谦、黄懿慧合编的《华人传播想象》（2012），以及黄旦、沈国麟合编的《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2013）。但独家发表的专著，目前还只有汪琪这部《迈向第二代本土研究》。行内早在打听这本书的「产期」，不久前《传播与社会学刊》邀请汪琪参加了一场「学术对谈」，谈的就是她对目前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看法（汪，2014）。作为学刊一方的对谈人，我捷足先读了这部书稿，对谈时更是近水楼台，提出了一些问题，得到汪琪的解答，受益菲浅。所以我很愿意为这部新作写些什么，虽然自忖没有评价它的资格，但还是愿意分享我的点滴心得，希望能起点「导读」的作用。其实在介绍那次「学术对谈」的「卷首语」（萧，2014）中，我已多少写下了一些感受，但意犹未尽，这次正好把我当时未来得及说的话补上。

要理解汪琪的这部新作，得从她本人的履历说起。汪琪有学贯中西的宝贵经历：出身于外交官世家，早年在海外耳濡目染；在美国攻取博士之后，先在美国东西文化中心从事研究，后返台湾执教，并致力于本土研究；在台湾、香港等地担任传播学讲座教授和院长期间，更积极推动本土与国际的学术交流。这一特殊经历让汪琪的本土化见解具有一种恢宏的国际视野。值得一提的还有汪琪长期主持「本土化研究」的资历。早在1998年，汪琪就已启动其「本土化研究」的大计，开办过数次工作坊。由香港回台北后，曾主持一个「顶尖大学研究计划」，主攻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为此她举办过国际学术会议，会议论文后来汇编成上述的英文专著（*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1）和一本期刊专辑（“Asi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ferment,” 2009），分别由劳特利其出版社（Routledge）和《亚洲传播期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出版。之后，汪琪又开启一个「中西对话系列丛书」的计划。新的研究经历再次拓展了汪琪的视野，她于是重新检讨第一代学者的本土化论述，这次检讨造就了她的新著《迈向第二代本土研究》。

从书名看出，这部《迈向第二代本土研究》的起点较高：从第二代的高度上检视过往的本土化观点。这一高度自然与汪琪长期主持本土研究的资历相关；但是话说回来，仅仅是「资历」和「辈份」不足以解释这部专著的思想高度，「资历」和「辈份」并不决定汪琪必然要「迈向第二代本土研究」。汪琪的「第二代」观点与其说是反映了学界的主流意见，不如说是来自她个人的深刻反思和批评意识。

的确，这部专著比现有的许多本土化论述站得更高，也走得更远。她所追求的本土化「不只在于回

归本土、也在走出本土」（第 259 页）。在她看来，70 年代以来港台大陆学界发起的「本土化」运动看似一路高歌猛进，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某个瓶颈。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令人焦虑的，是不但『本土化』概念掺杂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学界对于本土学术发展也呈现两极化倾向：或是追随主流、或是专注本土」（2014，第 4 页）。这一问题反映出学界并不真正了解「本土化」的目的，因此不清楚应该如何实现「本土化」。汪琪认为「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国际主流对话（2014，第 9-11 页）。

回归本土不难，走出本土也不难——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的科玄论战中打得不可开交的「玄学派」和「科学派」就已经分别这样做了；难的是两者结合。在我看来，汪琪的心始终是向着本土的，言语间处处流露出对本土的眷顾。据汪琪自己说，她早年的几本著作「都是在凸显媒体的文化特色、『在地』观点或经验」（2014，第 4 页）。这次回首过去，其用意也是要「迈向」第二代本土研究。正是因为有她「立足本土」之情深，才有她「走出本土」，「与主流对话」之意切。

汪琪清楚地意识到，「只是凸显本土经验是不够的，因为本土学术发展最终无法回避理论层级的讨论与对话」。为此她建议我们走出「本土/国际」二分的思维模式，而要这样做，首先要小心使用「本土化」这一概念，原因是它「掺杂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其中包括了本土「在地化」、「典型化」、「本质化」、「中国化」、「港台化」等片面的说法（2014，第 2-10 页）。更有甚者，这个「化」有演化成狭隘的本土主义之危险，汪琪相信狭隘的本土主义没有出路，只会把本土研究引向一种极端的做法，或是「专注本土」，或是「追随【西方】主流」。不幸的是，她看到这种两极化的危险正在成为现实，许多华人学者都在忙着经营自己的一小块「本土」，结果是没有「整合性的整理与分析」、「欠缺理论论述」、「不事经营学术主张」、「对于研究问题与观察角度欠缺自主性」、「被动地『套用』或『照搬』现成理论」，最后事与愿违，「华人学者基本上都仍然是在复制西方的理论论述」（第 22-38 页）。

「迈向第二代本土研究」，意味着学者要进入一个新的问题区域。对我来说，这部新著最有价值的地方还不在于它给出的答案，而在于它引发我们去思考的一系列新问题。譬如，「本土文化」是否可以还原为某种「本质」？是否有必要区分「本土」与「非本土」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研究是否就是「本土研究」？我们是否有评判「本土」的客观准则？本土化是否应该牵扯上族群情结？研究传统的观念和方法是否就是本土研究？如何避免西方视角和西化立场？…… 这些问题是冲着目前本土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来的，所以不是一般的问题。我们不一定认同这里的每一个问题，但不能不承认它们都根茎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若单独来看，这些问题也许不是什么新问题，也许都在这样那样的场合被人讨论过。但总体来看，它们展现了一种新思维，新在它们超越了本土/外来二分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它们是在一个新的、开放的思维框架下和盘端出来的。不错，我们仍然可以坚持旧的本土化思路，并从这一思路上来回答上述问题，但不可否认，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已经开放了从另外一个思路上来回答的可能性。新一代本土学者不是非要在汪琪的问题框架下思考和工作，但起码要响应汪琪的问题，并要尝试给出合理的说法。

新一代本土学者要走出本土，与国际学术对话，意味着他们还必须摆脱「特殊/普世」二分的思维模式。汪琪很清楚，如果我们仍像西方和本土许多学者那样，简单地套用这个二分模式来区隔本土学术和西方学术的话，对话将演变为另外一种两极化：或是各说各话（专注本土），或是搬用西方的理论论述（追随主流）。有趣的是，汪琪采取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在「本土」还是「国际」的问题上，汪琪的做法是「走出本土」；而在本土「特殊性」还是西方「普世性」的问题上，她却选择把西方拉回到它的「本土」原点，「西方不过是另一个『本土』」（第 30 页）。既然西方不代表「普世」，对话也就不必要套用西方的论述。

但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为了避免各方学者各说各话，汪琪还「必须寻找一条『异』中可以求『同』的途径」，她于是主张用「可共量性」概念取代「普世性」（2014，第 7 页）。「可共量性/不可共量性」（commensurability/incommensurability）源自孔恩（Thomas Samuel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之所以要说「革命」，是因为孔恩认为新的科学典范不可能从旧的典范内部自发产生出来，新旧典范使用不同的语汇，彼此无法对译和互通。孔恩说它们「不可共量」，意谓它们是不可比较的。但因为「不可共量」的说法无法解释在不同典范下工作的科学家仍然可以沟通的事实，孔恩在晚年修正了原先的一些说法，在他看来，「不可翻译」的语汇不一定就「不可诠释」，因此在不同典范下工作的人们仍然可

以借助「诠释」来达至相互的理解（Kuhn, Conant & Haugeland, 2000, pp. 36-38）。这一修正开放了一种可能性：「不可共量」的语汇或概念经由适当的「诠释」之后是「可以共量的」。「可共量性」概念在此被汪琪用来说明本土学术在国际间与其他本土学术对话的可能性。这个「可共量性」而不是「普世性」的选择再一次显示了汪琪的本土倾向，对她来说，「『可共量』有一个『普世性』所没有的关键性优点，就是它所要求的是『相似』或『对等』、而非绝对的『相同』；……因为只是『雷同』，『特殊性』就保有了一个合理的存在空间」（2014，第8页）。

由此看来，在汪琪的本土化论述架构里，「诠释」（interpretation）最后承担了促进学术对话的重托，它甚至承载了本土研究发展的希望，它因此必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样一个论述架构决定了这里说的「诠释」既不同于「翻译」（translation），也有别于一般人所理解的「诠释」。它需要处理好「不可翻译性」与「可共量性」的关系，前者解释了本土学术的「特殊性」，后者则解释了它由「特殊」走向「共通」的可能性。因为这样，它至少要分两步走，即「由『普世』到『特殊』、再由『特殊』到『可共量性』」（第214页）。从另一角度来说，诠释意味着诠释者不能满足于寻求意思相等或相近的语汇，他还要「进入概念与命题的历史脉络」（第212页）。如何进入？汪琪提供了以下方法，它包括两个重要步骤：

首先，要扩大文献探讨（literature review）所参考的范围。不但包括相关理论过去的讨论，也包括这些理论的思想根源与历史文化背景，同时找出所有本土文献中足以连结「本土」与「外来」观点与关怀重点的论述。其次，由于这些本土观点、思想与关怀重点未必是以现代所谓「科学语言」所书写，甚且也不合乎社会科学的论述原则，因此在分析比较「外来」与「本土」的「异」、「同」及其理论上的意义之前，必须经过「诠释」与「翻译」，将其转化成为得以与「外来」论述对话的语言（第251-252页）。

汪琪在最后一章（第六章）还提供了一个具体实施这一方法的分析案例。我个人认为，「进入概念与命题的历史脉络」是必须的，但在具体的操作上，我们可以不拘一格，我们可以有各种进入到「历史脉络」中去寻求「特殊性」和「可共量性」的途径。就是在以上方法的框架之下，我们也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做法。思想史家如张灏、墨子刻、史华慈等已开拓出一些具体进入「中国历史脉络」的路径，譬如从当事人的思想环境和生存情境进入（如张灏，2006），或者从儒学传统的「共同语法」入手（如墨子刻，1996）、又或者从中国文化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sques）出发（如史华慈，见林同奇，2002），这些路径各自代表了一种处理和分析历史文献的方法。学者在寻求进入历史文献的同时，也在寻求一种理解和对话的方式。本土的传播学者可以参考这些方法和途径。但无论是何种方法和途径，它们都将见证汪琪所说的那个「批判/吸纳、对抗/融合、破坏/建立的过程」（第212页）。

在我看来，本书有两个思想亮点，让这本视野高远的专论立足一个道德高地而又不至于高不胜寒。首先是对文化间对话的冀望。把跨文化对话看作是「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汪琪个人的理解和愿望，本土学者不一定都这样想，这不一定就是他们发起「本土化」运动的初衷。但我认为这是汪琪的灼识，它展示了一种国际视野，也为「本土化」或本土学术发展安排了一个美好去处，「本土化」不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这毕竟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从哪个意义上理解它）。

其次是汪琪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她在第二、第三章指出目前「本土化」的许多问题（譬如欠缺自主性）都可以追根求源到华人文化的治学传统、教育体制、和学术政策，她的意思是要本土学者更多地思考中华文化自身的问题。对她来说：「今天华人学术发展所面对的也绝不只是一个学术帝国主义的问题，而是学术典范、教育体制与政策问题，更是历史文化问题——是一个关乎整体、而非只是「本土」或非西方学界的问题。文化是关键、也是所有上述因素背后的根源；它不是一个冰冷遥远的研究题材，也是研究的本身」（自序）。「本土化」不是固步自封，发展本土学术与提倡文化反思不相冲突，中国文化不是也讲究反求诸己吗，所以这一要求不过份，起码在道德上说得过去。

我个人认为，汪琪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理论架构，这是一个完整的架构，每个部份都经过仔细的斟酌和推敲，而部份与部份之间则由若干重要的文化价值理念铆接在一起。任何理论架构都需要某些价值理念从中穿针引线，所以不是问题。我倒认为汪琪对跨文化对话的热切关照和她强烈的反思意识正好凸显出她的本土化论述的主要特色。

参考文献

1. Kuhn, T. S., Conant, J., & Haugeland, J. (Eds.) (2000).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 philosophical essays, 1970-1993, with an autobiographical intervie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Wang, G. (Ed.) (2011). *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hanging questions and altering frameworks*. London: Routledge.
3. Wang, G. (Ed.) (2009). Special issue: Asi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ferment – Moving beyond Eurocentrism.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 (4).
4. 冯应谦、黄懿慧编 (2012): 《华人传播想象》,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5. 黄旦、沈国麟编 (2013): 《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6. 林同奇 (2002): 〈他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 《世界史学》, 第 2 期, 第 38-66 页。
7. 汪琪 (2014): 〈本土传播研究的下一步〉, 《传播与社会学刊》, 第29期, 第1-15页。
8. 萧小穗 (2014): 〈走出简单的二分模式〉, 《传播与社会学刊》, 第 29 期, 第 v-x 页。
9. 墨子刻 (1996)。《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0. 张灏 (2006)。《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寻求秩序与意义》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高力克、王跃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

Introduction to “Toward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indigenous research”

Xiaosui Xiao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Abstract: Georgette Wang has been recognized for her long-committed and path-breaking effort to develop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is recent work she takes the indigenization issue in a more critical and more self-reflexive direction and alerts us to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methodological paradigm in dealing with indigenization in academic research. The book begins by developing a critique of current Chinese indigenous research. It then situates the problem within the long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call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past Chinese scholarly practic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academic policies. The failure to recognize these restrictions, according to Professor Wang, will lead indigenous research to another ideological dead-end. The purpose of the book is to take us to a broader horizon to understand the demand to engage dialogue with the mainstream Wes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ppreciating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local experiences.

Keywords : Indigenous research, the dominance of Western scholarship, cross-cultural dialogue, commensurability, interpretation

7/13/2015